



从江南雅韵到边地情结

——写在《危险的边疆 游牧帝国与中国》中译本之后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1-0100-04

●袁 剑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E

作为继拉铁摩尔的作品之后,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边疆史的范式性作品,著名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教授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的中译本^①,在经历了三年的修修改改之后,终于定稿付梓了。可以说,这三年的翻译过程,也正是自己在学术和生活上困惑——解索——再困惑——再解索的过程的写照。在翻译之初,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此书的介绍性文章,名为《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发表在《读书》2009年第4期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关注,也连带激发了自己对于边疆问题更大的兴趣。而如今,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巴菲尔德教授的这部名著的译本上面,作为译者的我感到很高兴,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既有来自学术上的,也有来自语言和心态上的。因为按照我所秉持的翻译理念,在外国著作的中译本出来之后,评判权就归到了各位读者的手中,译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被检视的对象。当然,这种来自读者的检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学术探讨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边疆”的个人体验史

回顾过去的那段翻译时光,作为译者的我总有着些许的诧异之感,究竟是什么动力驱使

① [美]巴菲尔德著 袁剑译.危险的边疆 游牧帝国与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着自己去完成 35 万字的中译的呢？在国内翻译稿酬低廉的现实情况之下，经济收益绝对不是自己最重要的动力。可以说，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相关老师的厚望以及自己对学术的热情才是我中译的主要动力所在。

一步步走到“边疆”，自己当初也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的转折。在这中间，既有机缘的巧合，也有自身理想的转变。我出生于江南的小城，从上小学起一直到读大学，在周遭的视野当中，皆是粉墙黛瓦、青田绿水，春天莺飞，夏日蛙鸣，秋满桂香，冬来萧瑟，我丝毫不曾有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体验，当时对边疆的印象也基本上得自道听途说以及仅见的一些图像资料，心中对边疆也谈不上有什么认识，更多的只是一些遐想。那时候的我，心中所期许的还是那种温润绵软的与世无争，那种本分真实的日常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或许这样的格局有些狭小，但毕竟还是处在那种环境下的自己在内心里所无法抹去的印迹。

进了大学，拜中文系的氛围所赐，喜欢翻阅各类杂书，也深知“语言加专业”的必要性，于是，在喜欢的写作之外，更知晓了文化现象与生俱来的多元性。从此，关注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江南一隅。在那时候所形成的购书癖，也表现为更多地购买非文学类的书籍，边疆史地著作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或许，这成为了自己以后专业转型的促成因素。

北京，对于历史来说，是古老的，但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这座城市与我自己的故乡苏州相比较，差异实在太太：一个是庞大的、威严的、喧嚣的、身处历史边疆的政治中心，一个则是微小的、卑谦的、安静的、身处文化核心的人文小城。但这并不妨碍两座城市共处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之上。而自己的边疆研究转向，也恰如北京与苏州之间的差别与共融一样，融入了自己的性格与学术理路当中。但同时，也正如最近袁行霈先生所勉励我的那样，在研究中国历史边疆的同时，也不忘璀璨多姿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来北京之时，当时的环境还没有如今这般浮躁，师生教学相长，彼此相切相磋，而作为普通学生，也无缘卷入绵绵无绝期的学术政治当中，可以说，更多地拥有的是一种学术自由人身份。当时，在完成必修的课程之外，自己还抽空出去听外校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课和方法课。虽然很多的知识现在已经遗忘了，但一种“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的探究理路产生于脑海中，自己转而时刻注意以更为宏大的边缘视角去看待中国历史的问题。

在之后的几年里，由于所处环境的改变，自己对边疆的热情开始扩展到中西比较的层面。在与欧洲同学就各自文化背景下城墙的意蕴的争论当中，在游历法德等国时穿越边境那一瞬间的感悟当中，终于亲身体会到了中国与欧洲在看待边疆的视角方面所存在的巨大不同，更不用说如今具有最强大理论话语权的美国学界看待中国边疆的基本观点与国内学界观念的分歧了。可以说，自己当初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找寻到这本书细致阅读并试图加以中译的，而庆幸的是，我的这种想法又得到了导师和丛书主持者刘东老师的热切鼓励。后来，自己又有幸参加了关于新清史的研讨会，并在之后专程去了一次甘肃。这些经历加深了自己对东北和西北地区在中国国家建构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的认识。而在自己的这种体验过程当中，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自己也进一步思考着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具体见《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0 月 19 日第 13 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自己对边疆热情的贯注与延伸。在这些年的学术实践当中，对巴菲尔德这部名著的关注与自己的相应探究是合二为一的。可以说，正是这些热情，成了我将此书尽力译出的动力所在。

二、边疆研究的范式性价值

在世界学术史上,自从美国学者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系统性地提出“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以来,社会科学界曾掀起了一波波的研究热潮,各种分析模型层出不穷,如今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早已是老生常谈。但在人文科学界,尤其是在中国的边疆研究界当中,范式的问题始终未能成为气候,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人文科学由于本身的特殊性,往往无法加以概念化和计量化分析,但另一方面,也在于要从人文现象的分析中提炼出范式,比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的范式构建更有难度和危险性,要进行这方面的尝试,需要有更大的理论勇气和更为宽容的学术批评环境。巴菲尔德教授的这本书则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整理和归纳,提出了一个贯通性地研究中国边疆史的颇具解释力的概念体系,并因此彰显出了在拉铁摩尔边疆范式与如今如火如荼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的解释模式之间的接续性价值,既能够厘清一系列之前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同时又能够激发我们更多的后续思考。

西方对中国边疆进行整体性研究始于拉铁摩尔。拉铁摩尔所强调的是以长城为代表的边界本身的特殊表现形式问题。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边疆政策不管发生怎样的变化,其最终的目的必然是要否定某一具体边界在包容或隔绝中原与边疆力量方面的作用,从而使得原有的线状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逐渐消失,转而使边疆地带的人群与社会本身具有边界的含义。这也就是说,出现了从固定化边界向流动化边界的转向问题。相应地,他的边疆研究所经历的是一条“由静到动”的基本路径。而在近三十年中风起云涌的美国新清史学派,则从清朝的满洲本位出发,通过重估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与地位,来强调清廷的族群政策及其多层次统治策略在固化清朝内部与外部边界方面的重要价值。如杨念群教授所言,满人入关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的传统认识,我们开始重视王朝延续层次上的“断裂”而非“延续”,凸显清朝皇帝的“多元共主”特征,在空间安排上则强调清朝沿“东——西”轴对广大疆域的控制,以打破旧清史以“南——北”纵向区域为主轴的叙事框架。(杨念群《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 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可以说,就边疆研究的视角而言,“新清史”所走的是一条“由动到静”的解释路径,在对清朝大开大合的边疆控制策略的阐述当中,将焦点确定到自身的“满洲性”至上。而在“由静到动”和“由动到静”这两环之间,巴菲尔德的这本书就补上了边疆范式当中“由动到动”的一环。他一开始通过对秦汉时期中原力量与匈奴关系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游牧力量在不同的状态下对中原政权所采用战略的一般性模式,并指出,强大的游牧力量与强大的中原王朝出现的时间往往是相互重合的,而双方又大致在同一时间走向衰亡,像秦汉——匈奴、隋唐——突厥、唐——回纥等等。当中原王朝力量巩固时,才可能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而持久地执行对边疆朝贡者的回馈政策,并有效地维持边疆秩序,而只有在游牧力量统一的时候,整个草原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到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协商体制当中。一旦其中的一方出现了政治混乱或走向衰落的话,围绕着长城一线所构成的力量平衡就会打破,另一方内部就会形成不稳定因素,并最终导致自身的混乱。可以说,这种对中原王朝与游牧力量之间历经数千年的互动局面的概括性阐释,成为巴菲尔德本书最引人注目之处,而他所提出的草原游牧力量在不同情况下所采取的“内部边界战略”和“外部边界战略”,



则成了边疆研究当中的重要范式。

当然,巴菲尔德教授的这一解释框架对某些细节方面还是无法圆融地阐释,他的弟子王明柯先生的《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就是为力图弥补这种缺憾所进行的尝试。不管怎么说,范式的意义不在于其无懈可击,反而在于其可证伪性和可拓展性。尽管巴菲尔德的这个解释体系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作为能够统摄数千年中国边疆历史的一种重要的解释路径,其范式性价值是很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学界如何能够从这些既有的边疆研究范式当中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新的解释路径。

三、“边地不是桃花源”问题意识与中国主体性

边疆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研究,它往往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其落脚点最终还是在国家结构和现实当中,中国如此,欧美亦然。

近两百年来,一代代的中国学人,从近代的西北史地学开始,孜孜于中国的边疆研究,力图通过对以前少有人关注的边地的深入探究,以拯济处于强邻环伺下的中国。在这些中国学人的心中,他们所做的这项事业就不仅仅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为学术而学术”了,还倾注着他们的悲国忧民之情。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史学界又开始从民族史、地方史以及中外交流史的角度对中国的边疆问题加以研究,从而将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尽管如此,姚大力先生还是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很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另外,中国自己的边疆史地学,多侧重于讨论历朝中央政府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而对边陲社会的回应还缺乏足够的注意。”(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载2007年5月25日《文汇报》)。我们也确实应该反思,在我们众多的边疆研究著作中到底有多少真正注意到了边陲社会的回应问题呢?如果还是口号式地复述几十年前的论断,还是不从边疆自身的视角和立场去体会一些具体的边疆事件的话,如果写作者不怀有深厚的边地情怀的话,那么,这种边疆研究就很难说有真正的意义。我自己之前曾经跟一位美国博士生讨论中国的边疆问题,他曾一脸轻松地问:失去西藏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么?是的,他是不觉得有什么影响,但我们深觉得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有极大的影响。

超越包括巴菲尔德本书在内的西方边疆研究的范式,并进而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本国边疆研究范式,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边疆地区的“同情之理解”,从而实现中国内部的边疆与中心地区的良性互动,并最终有助于国家学术与社会的发展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这本书的中译,我在江南故乡之外,拥有了另一个故乡,那就是边疆。

[收稿日期]2011-10-07

[作者简介]袁 剑(1981~)男,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系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 100872